

寿梦以前吴国史探讨

王卫平

先秦吴国的历史,人们论述较多的是春秋后期,也即吴王阖闾和夫差在位期间。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吴国的文治武功达到顶峰,另一方面则是文献的记载比较集中和系统。但对于寿梦以前的吴国历史却不甚了了,有人甚至称自太伯、仲雍南奔立国至其十九世孙寿梦上台的六百年间是一片空白。随着现代考古事业的发展,吴国的文物屡有出土,这就为我们了解寿梦以前的吴国历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对这一段历史作些初步探讨。

一、太伯、仲雍南奔与“勾吴”国的建立

尽管一些学者否定太伯、仲雍与“勾吴”的关系,但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吴、周同姓,吴国统治者是周人的后裔。

《史记·吴太伯世家》等书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史记》所谓的“荆蛮”,泛指东南广大地区。而太伯、仲雍所奔的具体地点,《史记》中并不明确。直到东汉以后,太伯、仲雍所奔的地望才一步步地被指明了。赵晔《吴越春秋》首先指出:“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又说:“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但梅里地在何处,赵晔亦未详言。到三国曹魏时王象《皇览》逐渐明确:“吴伯冢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其后萧梁时期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说得更为清楚:“无锡县东皇山有太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六朝学者所言太伯冢地望至唐代便变成了太伯城所在,唐初《括地志》谓:“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又把《皇览》所说太伯冢去吴县城十里弥缝解释为:“太伯冢在吴县北五十里无锡县界鸿山上,去太伯所居城十里”。其后唐张守节《史记正义》、陆广微《吴地记》、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范成大《吴郡志》及历代史志皆沿用不废。

如果把史志典籍中关于太伯、仲雍奔吴的史料按时代先后加以排列比较,就可以发现:关于太伯、仲雍奔吴的地望越是晚出的说得越清楚具体,而时代越早的则说得越含混模糊。因此,关于太伯、仲雍南奔立足于无锡梅里的说法和其他古史传说一样是层累地堆积、形成的^①。其可信据的程度当然就成问题了。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太伯、仲雍南奔立国之地应该在宁镇地区。

先看文献记载。据《世本八种》张澍集补注本称:“熟移丹徒句吴”。熟,学者确认为太伯弟仲雍之字。《世本》为秦至汉初古籍,是最早具体指明太伯、仲雍南奔建国地望的史书,较之于后人的比附更为可信。

再看考古发现。根据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等单位近年来的考古普查,发现宁镇地区广泛分布着吴文化的遗存。据不完全统计,从5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出土的有青铜器随葬的西周至春秋晚期的墓葬已近百座,其中属西周时期的就有仪征破山口、丹徒烟墩山、母子墩、磨盘墩、丁岗墩上村墓、溧水乌山一、二号墓、丹阳司徒、南京浦口、江宁陶吴镇及安徽屯溪等墓葬,而仪征破山口遗址最能说明问题。仪征破山口曾在1930年出土过一批西周青铜器,1959年南京博物院又在该处作了一次探掘,出土一批西周青铜器,并知道出土处是一个“长方竖穴土坑古墓”,系中原墓制;现存的青铜器,从形制、花纹以及制作手法上看,属于西周早期的产品^②。与丹徒和皖南屯溪的西周墓相比,仪征破山口的墓制与遗物都更接近周文化原貌,年代可能更早,因此有人推测“仪征或其附近可能是周人南下的初到之地”^③。

相当于商周时代,与吴文化有承继关系的宁镇地区土著文化——湖熟文化(前期为先吴文化,后期即吴文化)，“其发达年代当西周初叶”^④。由此也传递出太伯、仲雍南奔建国从而推动当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信息。

太伯、仲雍南奔立国宁镇说还可从“勾吴”名号的确立得到印证。关于“勾吴”的含义，历来说法不一。其中以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注》所说“勾”为“夷俗语之发声”影响最大。但从“勾吴”（攻吴、工猷、攻猷）可倒书为吴干、禺邗，又可单书为干、邗可证，“勾”决非“夷俗语之发声”，而是一个实词。由《管子·小问》所载干国和干、吴多次发生战争推断，“勾吴”应是吴人征服干（勾、邗）人的结果^⑤。

“勾吴”名号既由吴人征服干人而来，则干人故地便是“勾吴”立国所在。考《左传》载：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今广陵邗江是”。又据《说文·邑部》：“邗，国名，今属临淮”。可见，邗（勾、干）地在今扬州一带。既然如此，太伯、仲雍南奔建国之地似也不会离此太远。而扬州与镇江隔江相望，两地都在早期湖熟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其后的文化发展面貌基本一致。结合上述文献与考古材料，“勾吴”立国于宁镇实为合乎情理之事。太伯、仲雍南奔立国之地在宁镇地区的观点，也基本可以成立。

二、“宜侯矢簋”与周章受封

太伯无嗣，死后由弟仲雍继位。《左传·哀公七年》有谓：“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篋以为饰”。也许太伯用“周礼”的一套来治理“勾吴”国家，效果并不理想，故而仲雍上台后，改变太伯的统治作风，顺从当地土著民俗，以便收买人心，巩固周人对于土著人民的统治。仲雍死后，君位先后由子季简、孙叔达继承。至其重孙周章，史书才有事迹可寻。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伯四世孙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周章君吴的事实正式得到周王朝的承认，吴国成为周王室的东南藩邦。

周章受封应有两次。《史记》所记为周武王时事。而武王之孙康王上台后，又进行了改封。“宜侯矢簋”的出土和铭文的识读，为我们提供了这次分封的具体细节。

1954年，丹徒县大港烟墩山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最重要的是带有铭文的“宜侯矢簋”。“宜侯矢簋”出土后，立即引起了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浓厚兴趣，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郭沫若、唐兰、陈梦家、岑仲勉等一批著名学者纷纷著文考释。至八十年代，又有杨向奎、李学勤等名家就矢簋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宜侯矢簋”之所以能持续地吸引名家的注重，造成学术界少有的轰动，不仅因为它“大可为西周初年井田制与奴隶制之佐证”^⑥，“它是已发现的唯一详记‘封建’诸侯的金文”^⑦，而且在于它是“吴为周裔”的实物佐证。

“宜侯矢簋”铭文长达126字，其中可辨认的有118字。根据为学术界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的考释，“宜侯矢簋”记载了周康王将虞侯矢改封到宜地为侯的经过；宜侯矢即《史记》所说的太伯四世孙周章；宜的地望在今丹徒一带。缘此，唐兰先生进一步揭示：“过去有些人曾经怀疑吴国不是周的同姓，怀疑周王的势力不能达到吴地等等，由于这个簋的发现，使古书上这一部分的史料复活了”^⑧。

周章由虞（通吴）侯改封为宜侯，仅仅是名称的变换，而未必移动封地，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簋铭的虞侯徙封于宜，可能和中伯改封到谢一样，移动未必很远”^⑨。

三、周章至寿梦以前吴国国情、疆域蠡测

周章至寿梦历十四世，五百余年。虽然史籍中关于吴国史事的文字记载很少，实物资料也不丰富，但从少量的古籍记载和考古资料中，我们仍可窥见一斑。

《左传·成公七年》称：吴国在寿梦时，尽取原属楚国的“蛮夷”之地，“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史记·吴世家》的说法稍有差别：“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又说：寿梦二年，巫臣自晋使吴，“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同样的记载还见于《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它们都说吴国到寿梦时才逐渐强大起来，其表现，一是与中原有了交往。二是开始称王。

事实并非如此。从句吴建立以后，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一直在进行，而且在寿梦以前吴国已经称王，并具备了相当强的国力。

关于句吴与中原的交往。如前所述，西周武、成、康王时期，句吴与周王室的关系非常密切。继仪征破

山口和丹徒烟墩山发现西周铜器以后,在宁镇、皖南的许多墓葬和窖藏遗址中均发现了具有西周时代风格的青铜器,它们明显地受到西周铜器的影响。尤其在大港母子墩西周早期墓中出土了一件铸有铭文的“伯簋”,在安徽屯溪西周中期墓葬中先后出土了铸有铭文的铜尊和公卣。它们都是由周人传带而来的中原铜器。可见,早在西周时期,句吴与中原王朝就有着密切的交往。

关于吴国称王和国力。从出土的吴国文物“者减钟”铭文可知,在寿梦的祖父句卑(即毕豸)时,吴国已称王^⑩。而且吴国称王也未必是从句卑才开始。吴国既已称王,应有相当的国力。从文献记载可知,早在春秋初期,吴国逐渐强盛,《管子·轻重甲》谓:齐桓公称霸时,“吴越不朝”。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威名何等显赫,而吴国竟不把他放在眼里,这种胆魄自非弱小的弹丸之国可言。为此,吴国受到了齐桓公的惩罚,《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说齐桓公“威加吴越”。至于“威加”的具体情形,《管子·小匡》中有所记载:“诸侯多沈乱,不服于天子。于是乎(齐)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吴国暂时受挫,力量有所削弱,但仍然不屈地图生存、求发展。《者减钟》铭云:“其登于上下……闻于四方”。语气何等不凡!《左传·宣公八年》记载:“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庄王)……盟吴、越而还”。楚庄王敢于问鼎中原,与强晋争衡,其实力之强可知,他在伐灭舒、蓼后,竟然不敢随便侵伐吴、越,反而与之订盟。可知到春秋中期,即寿梦父、祖辈,吴国已是不容轻视。而寿梦正是在先辈奠定的基础上,开始了进一步的扩张。

关于吴国疆域。古代国力的强弱是与疆域的大小密切相关的。从句吴立国到寿梦上台以前,吴国的政治中心虽未变动,疆域却是不断扩大的。湖熟文化自西周起即可称为吴文化。吴文化遗存的分布区域也就是吴国的疆域范围,尽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伸有缩,但这不妨碍我们总体上的把握。对此,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审视。

从土墩墓遗存的分布来看。吴文化最具特色的因素是土墩墓,土墩墓的分布范围大致反映出吴国疆域的范围。就目前所知,西起皖南屯溪,东至上海金山戚家墩,南到苏、浙交界的太湖沿线,北过长江抵仪征、六合两县,在这依江东西约200余公里的地区范围内,无论是丘陵地区,还是河网平原,都见有土墩墓遗存。具体到各个地方,土墩墓的分布情形又有不同。宁镇地区是土墩墓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据镇江博物馆1987年对镇江市所辖句容、丹徒和丹阳三县市范围的遥感调查,共查出土墩墓3134座),皖南地区次之,而太湖地区则零星稀疏,有些县如常熟、昆山、太仓等至今尚未发现。从时间上说,太湖以东地区的土墩墓一般比宁镇地区较晚,大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期间,上海金山戚家墩所清理的土墩墓要到战国。而宁镇地区土墩墓,根据考古资料,早见于西周初期,盛行于西周时代,至春秋战国之交随着吴国的灭亡即绝迹不见^⑪。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1)早期吴文化的中心在宁镇地区;(2)西周时代吴国的疆域范围:西南以九华山、黄山和天目山为界,北达长江北岸的仪征、六合一带,东、南抵武进孟河和丹阳九山河流域;(3)大约在春秋前期,吴国势力已渗透到太湖以东地区。

从吴国青铜器分布来看。迄今为止,在太湖地区还没有发现相当于西周时期吴国的青铜器,时代最早的如无锡北周巷窖藏青铜器,年代大致在春秋早期。西周前期的吴国青铜器主要发现在宁镇地区。西周中晚期大大向南推进,如屯溪墓座落在皖、浙、赣边界地区。由此情况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1)早期吴文化中心在宁镇地区;(2)大约在西周中期,吴国的疆域已推进到皖南地区;(3)约在春秋前期,太湖东北地区成为吴国的统治区域。

把土墩墓分布和青铜器分布的情况互相印证,可以看到:在寿梦以前,吴国的统治中心在宁镇地区,其疆域情况大致为:西包皖南,北过长江,东、南边界已推进到太湖东岸。在春秋中期以前,经过吴地人民的辛勤劳作和吴国十几代君主的艰苦经营,吴国国力已不容低估,疆域大为扩展。寿梦时“称王”和吴国“始大”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四、寿梦时代的吴国

寿梦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君主。他不愿蜗居江南一地,永远被人鄙视为“蛮夷”之邦,因而采取积极措施,改变本国在诸侯心目中的形象,进而要求在中原政治舞台登场亮相。

寿梦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朝见周天子。自西周中期以后,吴国与周王室联系渐少。为了加深周天子和中原诸侯的印象,确立自己的地位,寿梦专程前往中原朝见共主周简王。一路上,他还“适楚,观诸侯礼

乐”^⑫。其后又与鲁成公会于钟离，“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⑬。通过观听，寿梦深为中原文化倾倒，说：“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临走还感叹道：“于乎哉，礼也！”^⑭虽然限于史料，我们无法洞知他归国后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方法措施来吸收先进文化，改革落后风习，但从他儿子季札身上可以推知，季札精通中原礼乐，恰当地评论中原歌舞，见微知著，具有高深的文化素养，中原的诸侯大臣对他都十分钦佩，即使儒家始祖孔子也极口赞誉：“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⑮。季札之能精通中原礼义和先进文化，必然受过系统的教育。这与其父寿梦的倡导、传播和推广是分不开的。《左传·昭公三十年》载楚国将军子西语谓：“吴光（即吴王阖闾）新得国……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把阖闾注重学习、吸取先进文化，说成是向“先王”看齐。说明寿梦确有学习中原先进的举措。

寿梦二年，吴国接受晋国的帮助，培植军事实力。楚国申公巫臣遭迫害而逃奔晋国，矢志报诛族之仇。他请求晋君出使吴国。其时晋国为了与楚国争衡，正考虑联吴制楚，故而晋君使巫臣“以两之一卒适吴”^⑯。吴王寿梦欲扩张势力，也需要外援，见晋国主动提供帮助，自是非常高兴，《左传》称“寿梦说之”。于是，巫臣“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⑰。必须指出，吴国早就掌握了射御、乘车之术，这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吴国墓葬中出土大量的青铜箭镞和车马器可以推知。巫臣的训练只是使吴军的射御、乘车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由于取得了晋国的帮助，吴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于是毁弃与楚国的盟约，挑起战端。《左传》称：“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楚大夫）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在长达七、八十年的吴楚战争中，双方互有胜负，直到公元前506年，寿梦之孙、吴王阖闾五战五胜，攻破郢都，吴楚战争才以吴胜楚败的结局而告终。

寿梦在对楚战争中占了上风，吴国的疆域随之拓展。《左传》所谓“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至于具体情况，可由寿梦时所铸的“冉钺”得到说明。1930年，罗振玉先生收集到一件吴国铜器，在《贞松堂集古遗文》中首次著录，其后屡见学者著录考释。于鸿志先生认为称“冉钺”最为确切，器主则是吴王寿梦。“冉钺”共有铭文九十字，于鸿志先生已作考释（按：为避免印刷的麻烦，此处不再引证）^⑱。现将其翻译成白话，全文如下：“（在某年）正月吉日丁亥这一天，我〔仲雍？〕的后代‘冉’（即寿梦），选择好铜为自己制造这件钺、铁（钺是器身，铁是敲棍），用它来指挥水军船只的前进或巡游，〔通行无阻在〕大的川流之上（大川，包含江、淮各水系），〔通航到各大川的〕南北流域，再达到宋国东北面的有名的孟渚。我用它来指挥咱们的军团行军。我用它来协调两岸上的咱们步兵的行止；我用它讨伐了巢国，我用它讨伐了徐国。嗟！子孙们，我‘冉’铸下这件钺和铁，你们不要弄丢敲棍和弄坏铜钺。我居住在这（周国的）南部疆土，传至一万辈之外，子子孙孙一定要团结振作，以〔全力服务周王室（？）〕”^⑲。从铭文可见，寿梦时吴国的北部疆域已从江北的扬（州）、仪（征）、六（合）一带发展到包括了江、淮大部分地区，一直深入到宋国东北部的孟渚（今河南商丘县东北）。

寿梦在位期间，曾多次与中原诸侯会盟，如成公十五年的钟离之会、襄公五年的善道之会和戚之盟，襄公十年的柤之会等等。这些会盟，扩大了吴国的影响，促进了吴国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加速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开发，使吴国日益壮大。从而为以后吴国争夺霸权、取得盟主地位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 徐启彤

①参见叶文宪《从太伯奔吴到越徙琅琊的考古学考察》，载《苏州铁道师院学报》1987年3期。②尹焕章《仪征破山口探掘出土铜器记略》，载《文物》1960年4期，王志敏等《介绍江苏仪征过去发现的几件西周青铜器》，载《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2期。③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148页。④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北阴阳营第一、二次的发掘》，载《考古学报》1958年1期；吴苏《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78年4期。⑤参见拙作《关于太伯、仲雍南奔建国的几个问题》，载《东南文化》1989年增刊。⑥⑧郭沫若《矢簋铭考释》，载《考古学报》1956年1期。⑦⑨李学勤《宜侯矢簋与吴国》，载《文物》1985年7期。⑩唐兰《宜侯矢簋考释》，载《考古学报》1956年2期。⑪郭沫若认为铭文中的“皮鞮”即颇高，马承源则释为句卑，此从马说。见马承源《关于季生盨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载《考古》1979年1期。⑫参见肖梦龙《试谈吴国土墩墓》，收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人类学论文选集》。⑬⑭⑮《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⑯《礼记》。⑰⑱《左传·成公七年》。⑲⑳于鸿志《吴国早期重器冉钺考》，载《东南文化》1988年2期。